



杭州月志

HANGZHOU YUEZHI

2020 第 11 期 | 总第 59 期



记录发展
传承历史
资世垂鉴
服务大局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杭州市地方志学会



2020 年第 11 期 | 总第 59 期

(浙内准字第 A080 号)

主办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杭州市地方志学会

杭州月志编辑部

主编：蒋文欢

副主编：阮关水 金利权

执行主编：冯跃民 马琦敏

编辑：王惟惟

编务：吴陈英

封面：竹雀图（宋）

封二：野菊秋鹑图（南宋 李安忠）

地址：杭州市解放东路 18 号市民中心 C 座 1911 室

邮编：310026

电话：0571-85253682

邮箱：29100390@qq.com

杭州地情网：hzfzw.hangzhou.gov.cn

制版：浙江都市快报控股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0 年 12 月 10 日

开本：889×1194 1/16

印量：1200 册

CONTENTS

目录

人物春秋

- 01 走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 曹晓波

志里寻踪

- 06 宋版《咸淳临安志》屡遭毁坏，最后能存世多亏了这些人 / 姜青青
12 隋唐杭州曾是“双城”布局 / 陈志坚

方志讲堂

- 19 “官不修衙而修志”——毛泽东对地方志的重视及其启示 / 陈东林

方志动态

- 23 【上级动态】
全国方志馆建设研讨会、全国方志馆业务培训班、全国方志馆讲解员业务培训班、国家方志馆分馆建设研讨会在河南焦作举办
第二届“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在杭州举办
《浙江通志》编纂告竣
- 27 【市级动态】
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锦利一行到杭州考察交流工作
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文胜一行到杭州考察交流工作
河南省禹州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郑锴一行到杭州交流工作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一行到杭州座谈
- 30 【区县动态】
挖掘历史，品味萧山——《萧山记忆》（第十一辑）出版
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讲解员培训顺利举办
《富阳年鉴（2020）》出版发行
《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再版发行
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会长王守亚到临安调研



杭城新事

- 33 杭州营商环境位列全国第一
全国首个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在余杭揭牌
- 34 杭州开通全国统一的儿童救助保护热线
2020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暨城市市长论坛在杭州召开
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学院开学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国际人才中心揭牌
- 35 2020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
2020 世界健康大会在杭州召开
2020 天猫双 11 全球狂欢季成交额 4982 亿元
淳安下姜村入选全球减贫案例
- 36 2020 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暨第八届中国电视产业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杭州首批“城市青年音乐角”启动
2020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在杭州举行
“新消费·醉杭州”2020 杭州休闲购物节启动
- 37 杭州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杭州开出首家“跨境新零售店”
富阳获评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
首届世界会长大会在杭州召开
- 38 杭州荣获 2020 中国最佳促进就业城市
2020 杭州（国际）影响力投资大会召开
《共产党宣言》系列版本捐赠仪式在杭州举行
杭州联合银行成功发放全国首笔“创新积分贷”

人物春秋

HANGZHOU YUEZHI
第一部分

责任编辑：马琦敏

走出《儒林外史》的 吴敬梓

□曹晓波

吴敬梓，字敏轩（1701—1754），安徽全椒县人，极轻钱财，不善营生。他33岁迁居南京，自号“秦淮寓客”。吴敬梓为人豁达，好结交朋友，好“倾酒”，几乎就是一个“灌”，有时边喝边唱，通宵达旦。不久穷了，冬日半夜冻醒，沿着城墙跑步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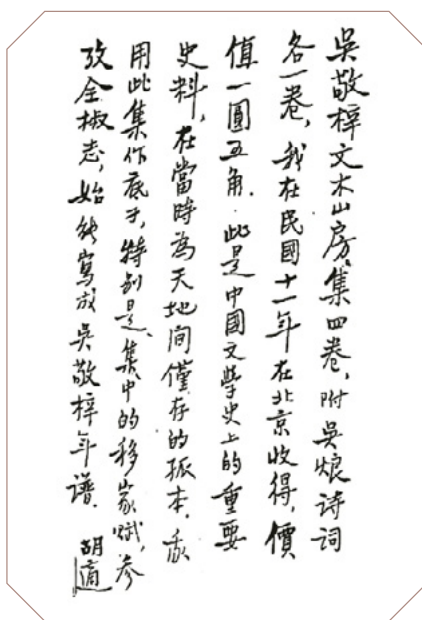
吴敬梓画像

胡适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櫟，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吴敬梓看穿官场，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他认为，“人”比“官”可贵，学问比八股文可贵，人格比富贵可贵。民国11年（1922），胡适在北京琉璃厂花了一块五角银洋，淘得吴敬梓《文木山房集》两本。胡适说：“此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在当时为天地间仅存的孤本”。是的，吴敬梓的众多诗文，因为贫穷，大多没能刊印留世，后人只知《儒林外史》。也因这本书，我们才晓得他来过杭州。

吴敬梓什么时候来的杭州

吴敬梓是乾隆十三年（1748），48岁来的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敬梓并非慕名游玩杭州。那时候，他常常吃了上顿，要等找到下顿的米，才能落锅。朋友来访，少不了要掬米提柴，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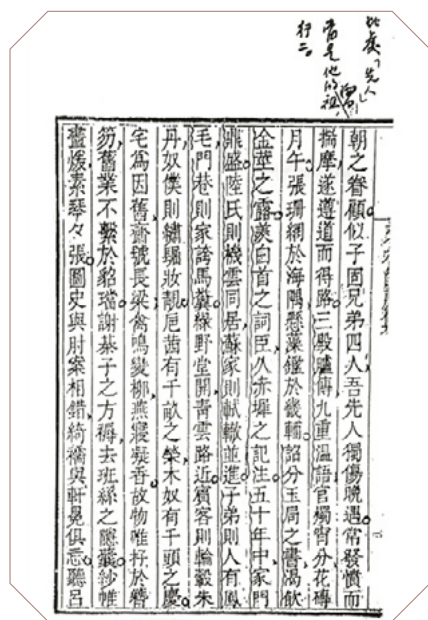
吴敬梓是路过杭州，要去遂安的。因为有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吴培源，从浙江余姚的县令，调任到了遂安县令。余姚是鱼米之乡，富庶民安。遂安偏僻贫瘠，乡风彪悍。吴培源，乾隆二年（1737）的三甲进士，为官清廉仁厚，施政崇善，却不会迎合上司。这让深谙官场营苟的吴敬梓日夜不安，他决定去遂安县一趟，和这位兄长般的老友聚聚。



胡适在《文木山房集》前的说明

遂安县城，就是如今千岛湖水底的“狮城”。遂安和淳安，紧靠徽南，这对于安徽人吴敬梓来说，走旱路也可以，但旱路多颠簸辗转。而走水路如果顺风顺水，从秦淮河落船，到杭州也就两天两夜，也能了却喜好游山玩水的吴敬梓对南宋故都的慕名，由此逆钱塘江而上，黄公望画卷中的富春江山水，也可一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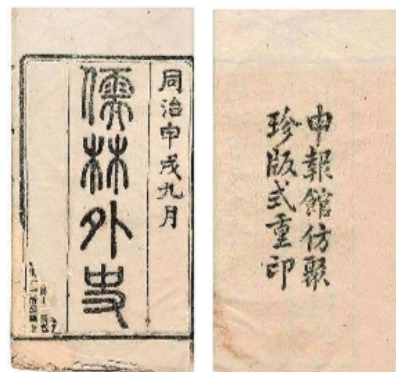
一本小说，年代、背景、地点、人物，有可能不便明写。但时间和节气，还是能读得出来。《儒林外史》第十四回，说马二先生在西湖上看“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还有“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服，一个脱去元色，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绡的八团衣服……（走时）一个丫鬟手持



胡适在《文木山房集》中的批语

黑纱团香扇，替她遮着日头”。这一些，应该发生在春末夏初，吴敬梓就是这季节来的杭州。

当然，场景也有借用。譬如说香客，“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的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拥着一把伞，手里擎着一个衣包，上了岸。”如果这写的是去昭庆寺，应该着笔钱塘门一段；如果说净寺，应该



老版《儒林外史》

出清波门；如果去灵隐寺，应该有茅家埠农景，但吴敬梓没有坐实。一顿饭，来了五六船拿包袱的香客，应该是吴敬梓在断河头船埠所见。

是的，《儒林外史》有两次写到了断河头这一张杭州的名片。如今，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断河头，就是萧山西兴的浙东运河码头的姊妹：三面全是船埠，停满北向的船只，拉动起了豆腐一桥、二桥、三桥这三条直街的商市，成了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场景。譬如第十四回，马二先生从嘉兴到杭州。譬如第十七回，匡超人和景兰江从乐清到杭州。都在断河头上的岸，都有“豆腐桥大街”的热闹。

不过，匡超人到断河头，纯属虚构。因为断河头是北向的码头，乐清来的船，绝对到不了断河头。吴敬梓这两次着笔，也看出季节的不同。当然，这是他囊中最羞涩的日子，不可能在杭州潇洒这么多天。马二先生的“胡乱”吃食，也是吴敬梓的自我写真。那么，为什么两次的描述，会有如此大的季节差异？末段将会说到。

吴敬梓上吴山 走的是伍公山道吗

吴山，是个统称，其间的山名有不少，上山的路也有不少。对于吴敬梓，即《儒林外史》的

马二先生，可能走的路有四条。从南到北是：察院前的城隍牌楼、鼓楼的伍公山、大井巷的环翠楼、藩司前的粮道山。此外，十五奎巷的茶啾弄、小井巷、管米山巷、大螺丝山巷、小螺丝山巷、四宜路花牌楼，在《儒林外史》中都没有蛛丝马迹，可以忽略不提。

城隍牌楼台阶，虽然最值得一提，但要从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说起。因为，在此之前，吴山上的城隍庙，供奉“保顺通惠侯”，是南宋凤凰山建皇城时，迁到吴山的，规模不大。

朱棣当政，浙江主管“公检法”的按察使叫周新，耿直清廉，不信邪。周新因为某事得罪了锦衣卫大太监纪纲，被解职送到京城。面对朱棣，周新大喊：为什么说我有罪？朱棣一怒，拉出去斩了！周新冤案澄清，朱棣也后悔。某日，他说梦见周新在阴间当了“浙江城隍”。于是下旨一道，重建浙江城隍庙（现城隍阁方位）。城隍庙一建，又在庙的正东，修了阔气的青石板台阶山道，山脚建四座石碑坊，人称“四牌楼”。

借此，恶补一下“城隍”二字：“城”指城墙，“隍”是护城水壕。“城隍”，古时候被看成是一方众生的守护，有神的存在。每一个府城、县城，都有自己的城隍神，俗称“城隍菩萨”。杭州是省城，吴山上有两座城隍

庙，一个是奉旨建造的“省城隍庙”，一个是杭州“府城隍庙”。吴山也就有了“城隍山”的名，《儒林外史》上也几次提到。

再说鼓楼伍公山：这是以春秋时祭祀伍子胥的庙命的名，此山最初也称“胥山”。《儒林外史》说，马二先生从这一路上的山。不过，在我所说的四条路中，这是最差的一条，完全没有马二先生走的那一种壮观的感觉。如果他真走了这山路，不可能不会写路边的雄伟鼓楼。至于否定马二先生，也就是吴敬梓，走这一条路的关键原因，后面还会说到。

说说第三条环翠楼山道：这一路比伍公山的青石板台阶更来得整齐，一丈多宽（约4米），厚实坚固。这山道因为在住宅的夹峙下，少见日头，极有沧桑感。山道中原本有一座牌楼似的亭子，或许是东狱庙的山门，这也是吴敬梓最有可能走的山路。不过，《儒林外史》中一个细节显示，这也不是吴敬梓走的路。

吴敬梓究竟是怎么游走的吴山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经意间，说到了本文要推出的第四条山路：藩司前的粮道山。这在第十七回中，匡超人第二次来杭州之前，乐清老家的潘保正（保长）问他：在杭州有没有熟人？匡超人说“没有”。潘保正说：我的族弟潘老三，在布政使

司衙门当差，他家就住在“司门前山上”。

布政使司，又称藩司，主管全省的人事、财粮、土地。这藩司的范围当年极大，就在如今吴山广场的延安南路一段，东侧部分，后来成了市公安局区域。在河坊街还没有拓宽之前，这一段叫“司前街”，也称“司门前”。民国20年（1931），河坊街拓宽，这一段俗称“藩司前”。“司门前山上”，正对了藩司大门，当年，这是一条上吴山的青石板台阶的大山道。

再说第十四回，马二先生游西湖回来，“进清波门，到了下（榻）处”，几乎说的就是清波门到藩司附近的一段距离。第三日，马二先生上吴山，“走不多远，已到了山脚”。看来，吴敬梓的下榻处，就在藩司附近。

如果朱棣不下旨重修省城隍庙，不修建城隍牌楼山道，在明初之前，这“司门前山上”就是最气派的一条上山路。一座青石榫卯砌成的上山牌坊，二层檐下的匾额，有“登高揽胜”四字，落款是元平章答剌罕脱欢。想想，一个弯弓射雕，马上得天下的武夫，能有如此书卷之气，也算是吴山胜景对人的教化潜移。

从“登高揽胜”的牌坊中走上去，那青石板台阶直到五十多年前还在，比城隍牌楼上山的台阶更逶迤、更开阔，两边还高低

错落着店铺与住家。那浅屋的店铺，以卖香烛冥纸为多。因为这吴山上的寺庙、道观，有二十多处，座座有根底，常年有香火。这一路，老杭州就叫“城隍山”。当然，叫“粮道山”的也有，因为明朝的布政使司粮道署，就在这“之”字形山道的拐弯处。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说这“之”字形山道：“到了山脚下，望着几十层阶级，走了上去，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马二先生一气走上去，不觉气喘。”要是走伍公山台阶，吴敬梓绝对写不出这感觉。

山顶上，是一马平川的步行道，这也是他山没有，借用不来的：“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注意，您要是从伍公庙，或者环翠楼，从东往西走，绝对看不到“左边”庙宇，“右边”江景。恰恰相反，那一种走法，应该看到的是，右边庙宇，左边江景。

这就是吴敬梓小说中的露拙，“左边”庙宇，“右边”江景，只能是粮道山台阶上来，从西往东走，才能看到。对照“同治”年的地图，这左边的庙宇依次是白衣殿、关帝殿、三官殿、眼光殿、广福殿、解神殿、仓神殿、财神殿、

药王殿、刘猛将军庙、王壮悯公祠。吴敬梓这么走去，一直到伍公庙。

伍公庙祭祀伍子胥，一位志在消灭越国的吴王相国，结果他壮志未酬，死于奸臣的谗言。吴地到此尽，隔江含恨去。在山上这么多的庙宇中，吴敬梓应该对这一座庙的感慨最深。当所有人都忘记了亡国恨的时候，只有他仍守望着这一江春去夏来的水。这也是吴敬梓刻意要在《儒林外史》中，写“吴相国伍公之庙”一路的原因。

这么一路走，马二先生，即吴敬梓，走的就是城隍庙的反方向了。马二先生来到“一个茶室，泡了一壶茶，看见有卖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点意思”。然后，马二先生去了城隍庙。事实应该是：伍公庙前卖茶的告诉马二先生，也就是吴敬梓，城隍庙你走反方向了。于是，马二先生往回走，才看见“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这也看出，在此之前，马二先生所看见的庙宇，都要比城隍庙小得多。

过了城隍庙，“又是一条小街”，这便是去“十二生肖”的那条平坦小路。当年，两旁也有店。吴敬梓这么走去，才有可能上了“极高的个山岗”，即紫阳山。他“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

一带，湖心亭都望见”。这一段，吴敬梓的“左边”与“右边”，就十二分的确切。

下了山岗的马二先生，一路还“钻进一个石，见（了）石壁上多少（的）名人题咏”，又到了“丁仙之祠。马二先生走进来，见中间塑一个仙人，左边一个仙鹤”。

这应该是吴敬梓往瑞石山方向走的描述，“石”就是紫阳洞，不深；“丁仙之祠”就是丁仙阁，不大。这也是一座吴山上最具传奇色彩之处，有丁仙纸鹤成真、腾云渡人的传说。或许，是吴敬梓从书上看得到的；或许，是他现场真实走过的。这虚虚实实，也就演绎出了一段马二先生与洪憨仙的故事。

吴敬梓有没有 第二次来过杭州？

吴敬梓第二次到杭州，是遂安归来，已经深秋，他在遂安住的时间不短。吴敬梓是接到吴培源的信，去的遂安。吴培源肯定在信中告诉吴敬梓，遂安虽然贫瘠，山水却是画一般秀丽，夏日凉快，适宜度暑。飘逸遣闲的吴敬梓，如此缱绻山水的度日，也是性情的一种。不过，三年后，从吴培源辞了遂安县令，告老回乡来看，吴敬梓这次狮城小住，确实启发了吴培源解脱官场营苟的思想。

吴敬梓的归程，应该得到了

吴培源的“程仪”。这种对远道客人送别的礼金，也不会太少。

吴敬梓第二次到了杭州，就多了游玩的潇洒，他坐过西湖游船。

有七绝《西湖归舟有感》为证：

“满地霜华满舵风，桑阴零落稻梁空。浓沾两袖西湖雨，洒向烟波月色中。”

这一日游湖，吴敬梓遇上了小雨。从船上看雨中苏堤，淅淅沥沥，水雾茫茫，恰似一幅十里花阴夹道迷，山压亭红树木溟的水墨画卷，透出了苏东坡那一种“山色空蒙雨亦奇”的韵味。这时候，应该是接近傍晚，阴云淡雾，极有月下游湖的意境。或许这时候，吴敬梓想起了多日不见的妻儿，他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桑阴零落稻梁空”，他应该早点返回了。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花港园”有过三次描写。第一次是第十四回：马二先生“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隔着一道板桥”。马二先生走了过去，“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仁宗皇帝”，宋朝、元朝、明朝各有一位，这也是吴敬梓对小说背景刻意施放的烟幕弹。

马二先生想去楼旁的那一座花园，这日正好有布政使司衙门的人在宴请，进不去。注意，在此，吴敬梓又一次写到了吴山“登高

揽胜”牌坊对面的布政使司衙门。

第二次也是第十四回：马二先生和洪憨仙受富二代胡三公子之邀，坐了轿，一起去赴宴。“花港园门大开”，“两席酒一本戏，吃了一日”。马二先生“想起前日独自一个看着别人吃酒席，今日恰好（有）人请我也在这里”。这一日，吃得丰盛，却没有写花港园的景色。

第三次是第十七回：匡超人被一帮“酸户头”拉去，说是凑份子到花港园办一桌酒，商量这次做诗拈哪一个字。这日，是清波门船埠坐的船，到了花港园。管门的人不让进，他说：上次你们借场地办酒席，连剩菜剩米剩柴都掳走了，这么贼骨，不借了。

如此再三的写“花港园”，说明吴敬梓极眷念这一景观，或许他真的进去过。他没有写花港园的观鱼池，也没有写康熙帝题写的“花港观鱼”石碑，那应该是他在刻意回避小说的时代背景，避开了以小说直指当下的嫌疑。

（作者系杭州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杭州日报》“城纪”“倾听”主笔）

志里寻踪

HANGZHOU YUEZHI
第二部分

责任编辑：马琦敏

宋版《咸淳临安志》 屡遭毁坏，最后能存 世多亏这些人

□姜青青

民国23年（1934）1月31日，北平天降大雪，非常寒冷。而“藏园”主人傅增湘展玩自己手上的这部“异书”却别有一番清雅闲逸的心境。这部所谓的“异书”，就是七百年前由南宋临安府官修的一部地方志——宋版《咸淳临安志》（以下简称《咸淳志》）。



宋版《咸淳临安志》

在傅增湘眼里,《咸淳志》就是南宋官修图书的一个范本,内容翔实,版式宽大,写刻工整,镌印绝精,所有这些官书的优点它均有很好的体现,放到整个南宋京城临安刻印的书中,它毫无疑问算得上是一件优秀作品。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当时临安市内雕版印刷业太繁荣了,在编撰出版的质量、水平和品位上,《咸淳志》都算不上出类拔萃。所以,作为一代藏书大家的傅增湘在他前期的藏书中,都没有这部典范之作的影子。那么,现在傅增湘何以又将它称作是一部“奇书”呢?

因为,就这部书,它在近三百年来,包含了太多中国文人的苦心、痛心和伤心。这是一种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感伤和悲哀,也是当时中国在文化上的一种“山河破碎”!还有什么能比“山河破碎”更令人伤痛欲绝、刻骨铭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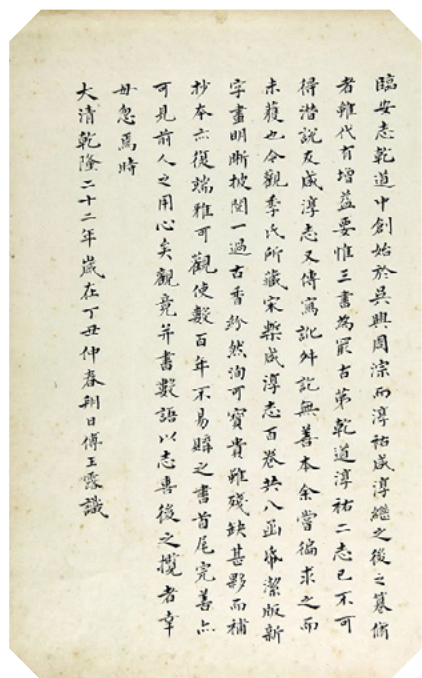
其实,从《咸淳志》出版问世的那天起,它就处在离散或失传的边缘。此书规模达100卷,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开始编修,到恭帝德祐年间(1275—1276)完成了全部雕版、印刷和装订工作。然而此时,北边蒙元大军正大刀阔斧地死磕南宋的长江重镇襄阳。破了襄阳后,蒙古人沿着长江顺风顺水一路东下,直逼江南临安城。可见《咸淳志》

呱呱坠地之时,正是南宋岌岌可危之际。所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宋本《咸淳志》如此稀缺,也与这部书的生不逢时有着极大的关系。

《咸淳志》书成不到一年,元军就占领了临安城,三年后南宋王朝彻底灭亡。元代《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载,此书的板片保存在西湖书院(在南宋太学故址,原浙江大学湖滨校区附近)。但明代初年,这些板片统统消亡,一点渣屑都没剩。于是,那些存世的书就面临着随时散佚毁灭的危险。除了元人的那部《重整书目》外,元明两代公私藏书目录中均无《咸淳志》的踪迹,这足以说明它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成为濒危的“稀有物种”。

而在清代,《咸淳志》忽然成为众多藏书家竞相传抄、借抄和收藏的珍籍。晚清学者黄士珣说,只要有宋本《咸淳志》新发现的消息,便会让人生出“大会名士庆赏于西湖”的念头。道光年间,杭州藏书家“振绮堂”主人汪远孙整理并重刻了《咸淳志》,这都是当时有责任心的藏书家看到了它极易散佚的险境,而形成了“以广其传”的共识。

从存世的《咸淳志》宋版原书上的收藏印和一些藏书目录记载来看,此书在流传、递藏、传抄、转让过程中,经手的人至少有30多个,最后形成三大部藏



宋版《咸淳临安志》上的傅王露题跋

书:现存南京图书馆的浙江钱塘丁丙“八千卷楼”藏本(现有32册95卷首1卷,其中宋版21卷),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本(现有40册78卷首1卷,其中宋版50卷首1卷),以及现存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浙江湖州陆心源“皕宋楼”藏本(现有48册95卷首1卷,其中宋版78卷首1卷)。三部书都已不足初始的百卷之数,流传中藏家互有交叉,源流也并不单一,尤其是“南图”藏本,其中

差不多四分之三为清人抄补本，而在日本的这部，却是保存宋本最多，也即原真性最高的《咸淳志》。

不过，最初“海源阁”和“皕宋楼”所藏的《咸淳志》无论是卷数上还是宋版的占比，都相差不多，各有所长。“海源阁”藏本中原有宋版原刻68卷（清人补抄27卷），相比“皕宋楼”藏本宋版少10卷，但像卷一的“京城四图”（《皇城图》《京城图》《西湖图》《浙江图》），就只有“海源阁”藏本是宋版的，“皕宋楼”藏本却是仿照宋版手绘的，图上地名多有缺失舛误。而同样是卷十六的宋版原图《府治图》，“皕宋楼”藏本又明显比“海源阁”的要清晰很多（估计“皕宋楼”的这幅图为初印本）。所以，两家藏本如果能相互弥补，各取所长，拼合一起，则基本上就可以补足一整部95卷的宋刻原版《咸淳志》。

但悲剧的是，这两家藏的《咸淳志》都遭到了意外。

先是“皕宋楼”，陆心源一生藏书的心血，在他去世后，他儿子因为经营不善变卖家藏，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被日本人全部席卷而去。今天日本“静嘉堂文库”最珍贵、最基本的藏书就是这些“皕宋楼”珍藏，包括这部《咸淳志》。

是年夏天，董康在北京刊行

了《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向国内知识界披露了“皕宋楼”藏书一卷不剩已归外人的“骇闻”，并且警告国人“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源阁，如八千卷楼……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

而就在舆论一片哗然之际，这年秋天又传来了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氏因经营钱庄巨亏而欲将藏书出售的消息，并风传刚在“皕宋楼”得手的日本人颇有得陇望蜀之想。

或许是受了“皕宋楼”事件的刺激，国人这次行动极快，大学者缪荃孙等人斡旋让书事宜，最终由两江总督端方出资7.3万元，“八千卷楼”藏书归于南京江南图书馆，包括《咸淳志》在内的这批珍藏幸免于重蹈“皕宋楼”的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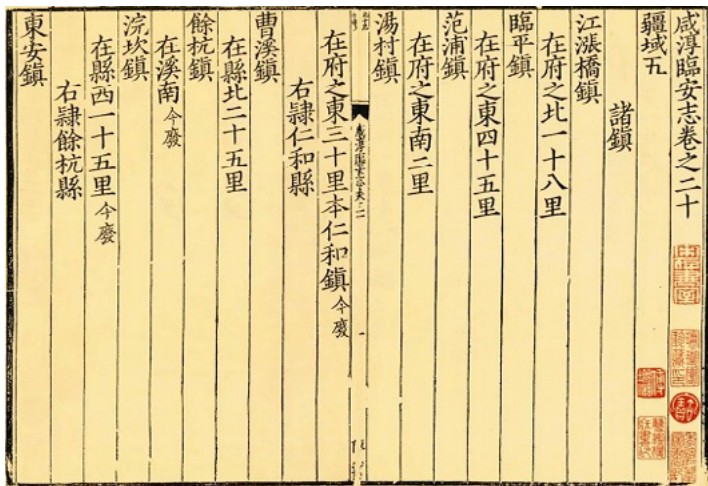
但是，接下来在民国19年

（1930）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兵乱，却教“海源阁”真的是躺着“中枪”，还不止一次，竟连中三次！与董康当年“警告”所不同的是，“海源阁”藏书的这次灾难未遭之于外，却罹之于内。

“海源阁”第一次“中枪”是在民国17年（1928）春。当时国民党北伐军西北军第十七师马鸿逵部攻占聊城，“海源阁”藏书便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损失。

“海源阁”主人杨敬夫还算是有预感的，想想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便挑选了一大批数百种宋元精槧，运到他的天津寓所。但仓促之间哪里运得走那么多好书？杨敬夫前脚刚走，更大的一场“书厄”接踵而至。

民国18年（1929）7月19日，河北馆陶土匪王金发占领聊城，“海源阁”扎扎实实被戮中了“第二枪”。王金发的司令部就设在



“海源阁”藏本宋版《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中的
“傅增湘”和“双鉴楼藏书印”两方印章

“海源阁”，这就好比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还有什么好指望的？更可怕的是王金发的书记官和参谋官中，樊天民和杨道南这两个家伙都是前清生员，他们非常“识货”，择选“海源阁”宋元秘笈和金石书画中的精品，劫掠而去。剩下的被土匪随意糟蹋，乱撕乱扔，有的拿来擦拭鸦片烟枪，有的用作灶头烧柴的引火纸，却嫌旧书纸张不易燃烧，大骂宋版书贵得无理。世人奉为瑰宝的“海源阁”藏书在这帮匪徒的肆虐下形同残砖碎瓦一般。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于是年11月前往聊城实地调查，亲眼目睹了“海源阁”的劫后惨状：“见其书零落，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二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宋本《蔡中郎集》第四册污秽满纸。愤懑不已，先就海源阁所藏善本书籍，逐一清点，亲自将书籍一一整理，登记造册。”

“海源阁”中的“第三枪”更是惨不忍睹。民国19年（1930）春，河北土匪王冠军带着被他收编的王金发部再次攻入聊城，一待就是半年。

其间，“海源阁”再次被王金发占据，熟门熟路的他因已知晓阁中藏书的价值，有意自个儿独占了，还颁布禁令，不准擅动藏书。哪晓得底下一帮痞子不买



海源阁劫后乱象（摄于1929年）

账，又对王金发平时的严厉管束怀恨在心，一不做二不休，将王给谋杀了。

这下，“海源阁”里真乱了，这帮痞子可着劲儿对阁书乱撕乱扯、焚琴煮鹤，点火烧饭用书，包捆东西用书，擦拭烟枪用书，糟蹋累了，睡觉枕头还是用书。

后来王冠军也知晓了“海源阁”藏书的珍贵，便从天津请来一名古籍古玩的行家“九爷”，历时一个月，检得阁书善本及一切有价值的碑帖字画等，囊括而去。此外，据王献唐了解，一名占据民宅的土匪睡觉没有枕头，便将一函8册《咸淳志》像拿一块砖头似的带走了，用作枕头，可后来上司也要抢宋版书，搜查得紧，他唯恐被查到吃不了兜着走，竟然将这8册书一把火烧了，连书篋也劈碎了烧水煮饭。

类似《咸淳志》的遭遇不计其数。而劫余书籍，匪徒们又任其暴晒室外，任其雨淋水浸。

《咸淳志》原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季振宜的藏书，是“海源阁”中堪称珍籍的宋版书。据杨以增的藏书目录《楹书隅录》记载，原有95卷、48册、8函（其中宋版原刻68卷，清人补抄27卷）。

但王献唐民国19年（1930）4月刊印的现场清查报告显示，“海源阁”民国18年（1929）7月那次遇劫之后，他在清点《咸淳志》时起先只见到一册，散置于地上乱书中，后经多方搜检，又找到一册，杨氏家人说还有数册《咸淳志》，但搜寻再三始终未有再见。皇皇百卷之巨的《咸淳志》，零落散佚竟存区区2册残本，这无疑是一场弥天浩劫！



1929年傅增湘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观书

民国18年（1929）12月，正当“海源阁”处于危难之时，傅增湘则在友人的襄助下，莅临日本“静嘉堂文库”观看和记录其中的珍本秘笈。12月13日这天，他看到了从“皕宋楼”流落至此的那部宋版《咸淳志》，看到了黄丕烈在此书上题写的4篇题跋。这是傅增湘第一次看到宋版《咸淳志》，看到这部书版式宽大，写刻精良，不禁感叹道：“杭本之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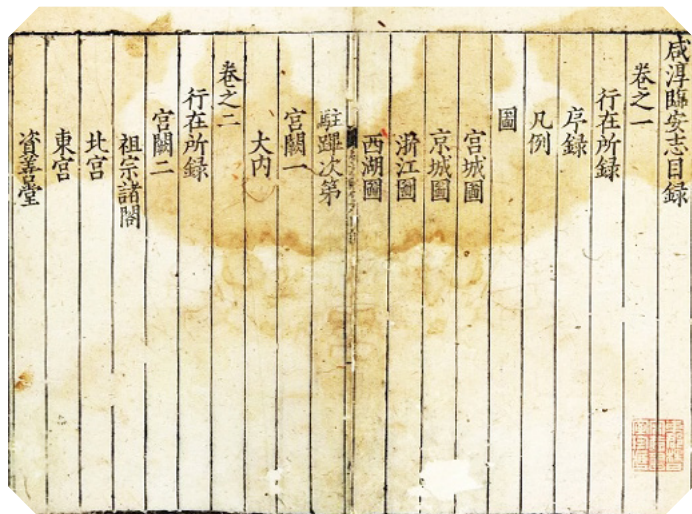
傅增湘回到北平后不久，惊闻“海源阁”遭此大难，唏嘘不已。

“海源阁”藏书散佚，而在此前后，寓居天津的杨氏后裔为生活所迫，也开始出让部分藏书，以求善价。北平琉璃厂的书贾闻风而动，除了天津，西至保定、顺德、大名，东至德州、济南、青岛，全力寻访。连日本人也闲不着，也在收罗仅存的这些遗书。

民国19年（1930）腊月将尽时，书贾董廉之携带5册10卷《临安志》造访，傅增湘见了之后颇为心动。作为赫赫有名的藏书家，他的“双鉴楼”藏书中有“地方志”一类，此时却没有堪为“领袖”的宋刊佳作，《咸淳志》如此名重天下，正可补自己藏书的缺门，因而以重价收下这些“海源阁”遗存。到民国22

年（1933），王献唐有次自济南来访，对傅增湘说起济南书肆中还有数册《咸淳志》待售，于是傅便请他代为谐价，结果对方6册12卷书要价400元大洋。傅增湘现金不够，便将自己部分藏书托人卖掉，这样才勉强凑齐了书款，给王献唐寄去。过了两个月后，书篋邮至，这样傅家前后收藏到11册共计22卷《咸淳志》，其中宋版和补抄本各11卷。这年8月，古籍版本学家赵万里又访得8册16卷《咸淳志》（其中宋版13卷，补抄3卷），送来给傅增湘看，但其800元的索价太高，傅无力收下，虽然爱不释手，最后也只得放弃了。

“海源阁”这部《咸淳志》分崩离析，傅增湘千方百计访求这部书的踪迹下落。除了自己藏有的这11册之外，赵万里那8册后来转让给了江绍杰，藏书家刘体智有1册，日本人开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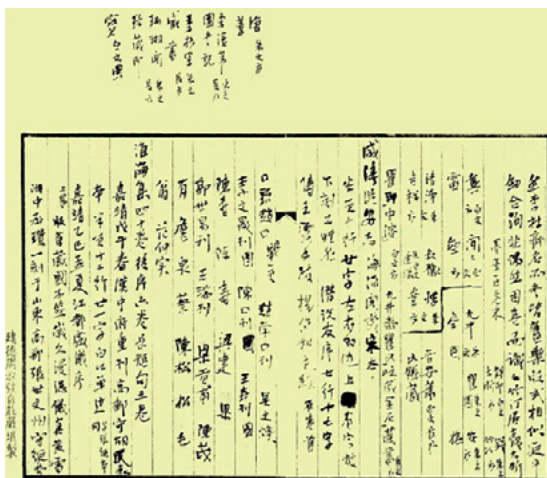


《咸淳临安志》目录

求堂”书肆有1册1卷，北平的古玩市面上还有1册。这样算来，仍不足原书48册的一半。傅增湘觉得这部书将永远再无完璧的可能，每念及于此，便深为叹息。

事实上，对于“海源阁”残本《咸淳志》的抢救，傅增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上海潘宗周就是一位卓有贡献的收藏者。他经过多年访求，先是收得3册《咸淳志》，随后将日本人“文求堂”的1册1卷收藏了，又把蒋祖诒从江绍杰手上收得的8册书（即赵万里最初想卖给傅增湘的那8册）收归自家“宝礼堂”。这样，潘家最终共收藏《咸淳志》12册23卷（其中宋版20卷，补抄3卷）。他也听闻傅增湘对《咸淳志》的收藏卷数与自己相差不多，掐指算来，此书仅找到了一半都不到的卷册，还应该还有20多册50多卷，只是不知它们现已飘坠何处，是否还有进一步挽救找回的可能？这是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文人共同的念想和期待。

傅、潘两人均以为《咸淳志》尚有一半以上不知流散何方，但后来随着时局的巨变和社会的变革，散碎离析的这部《咸淳志》最终却奇迹般地集聚在了一起。据后世学者的统计，最初收藏《咸淳志》以傅、潘两家最多，其余散落各处的尚有18册32卷，后来涓涓滴滴、陆陆续续都归入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



周叔弢《古书经眼录》记录的《咸淳临安志》即购自海源阁，杨氏藏书是周氏平生收书最精的部分

藏。而傅、潘两家的藏本最终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均捐给了“北图”。这样一来，经整理，今“国图”所藏的“海源阁”本《咸淳志》共计40册78卷另有卷首1卷（其中宋版50卷首1卷，抄本28卷）。也就是说，所缺的8册17卷，正是当年被那个土匪先作枕头、继而焚毁的那部分。但无论如何，经过有识之士不遗余力的搜寻，遭此大劫的《咸淳志》终于有80%左右的卷册被寻回，大大出乎傅增湘和潘宗周当年的预期，实属不幸中的大幸！

而且，零散本中天津周叔弢收藏的该书第一卷，有宋刻原版的“京城四图”，即《皇城图》《京城图》《西湖图》《浙江图》，四图共记载了1582个地名。这是海内外现存唯一的宋版“京城四图”，余下南京和日本所藏《咸

淳志》的“京城四图”均为清代摹本，谬误极多，是以这四张宋版原图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非常高。又因为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原丁氏藏本保存完好（虽然其中只有21卷为原刻宋版，其余均为清人的补抄本），北京和南京的这两部书两相互补，人们依然能够看到保存最完整的《咸淳志》。而假如有朝一日分藏于北京、南京和东京的这三部书也能两相互补，则世上将会有一部95卷全部都是宋版原刻的《咸淳志》。在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剧烈变革之后，现存最完整的、最原真的《咸淳志》依然在世。

（作者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隋唐杭州曾是『双城』布局

□ 陈志坚

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
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
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



这是唐代白居易的《余杭形胜》一诗。诗中的“余杭”，是“余杭郡”的省略，余杭郡则是杭州的别称，而非指余杭县。也就是说，这首诗，讲的是杭州的地理大局。其中关键的诗句是“州傍青山县枕湖”。这句诗有两个对象，一是“州”，二是“县”。

本文便要对这句诗做出新的理解，认为这里的“州”和“县”，分别指的是“杭州州城”和“钱塘县城”。这句诗的意思是：州城是依靠着青山，而县城则依枕着西湖。其实，白居易想表达的是，杭州城当时有着两个独立的小城——州城和县城。

唐代的杭州州城，大致就相当于后来南宋皇城范围。在州城里面，不仅有杭州的州政府官衙，还驻有军队。但州城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老百姓居住，而是个官方机构集中区。在唐代，这种城也叫“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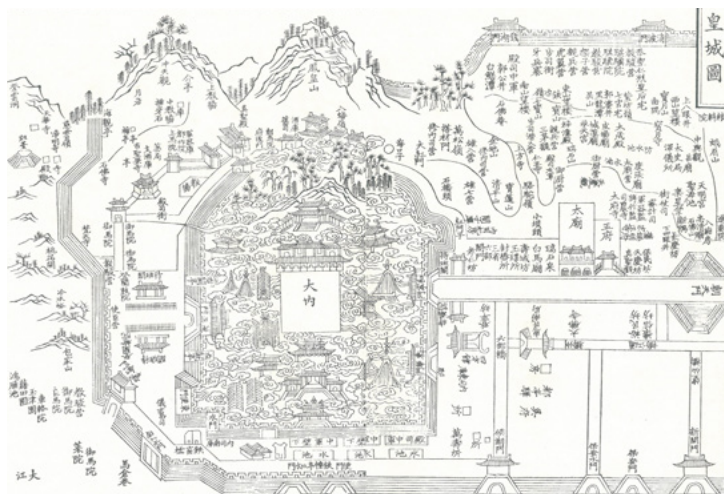
唐代的钱塘县城，则与州城相隔十里地，位置就在西湖东北方向。钱塘县城大致在钱塘门以东以北的范围内。这两城互不统属，各自分离。难怪在第一句诗里，白居易会说“余杭形胜四方无”。杭州这种“双城”布局天下罕见啊。

那么，为什么杭州城市布局会这么奇特呢？其实，这与杨素新造“杭州城”有关。

一、隋代杭州城是个大城吗？

杭州立州时间在隋开皇九年（589），在隋灭陈之后。但杭州州治所在，却先后发生了几次转移。最初杭州的治所，设在余杭县。第二年，杭州治所移至钱塘县。第三年，杭州治所再次移至杭州州城。这个过程，在《旧唐书·地理志》里面记载的很清楚：钱塘。汉县，属会稽郡。隋于余杭县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

这个“州城”，就是杭州城，始建于隋代，是杨素在平江南之乱时所修。其实，《旧唐书·地



《咸淳临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图

理志》的这个记载，已经明确地说明杭州城在“柳浦西”，其范围并不大；而且，杭州州城和钱塘县城并不在一起。

但是现在的流行看法，是将杭州城理解成一个范围很广的城，与宋代的杭州城相差不远。当然，这种看法也是有文献支持的，如南宋的三部《临安志》，都提到有“三十六里”之周长。在此基础上，经过很多学者的反复讨论，甚至已经将杭州城的四边都考证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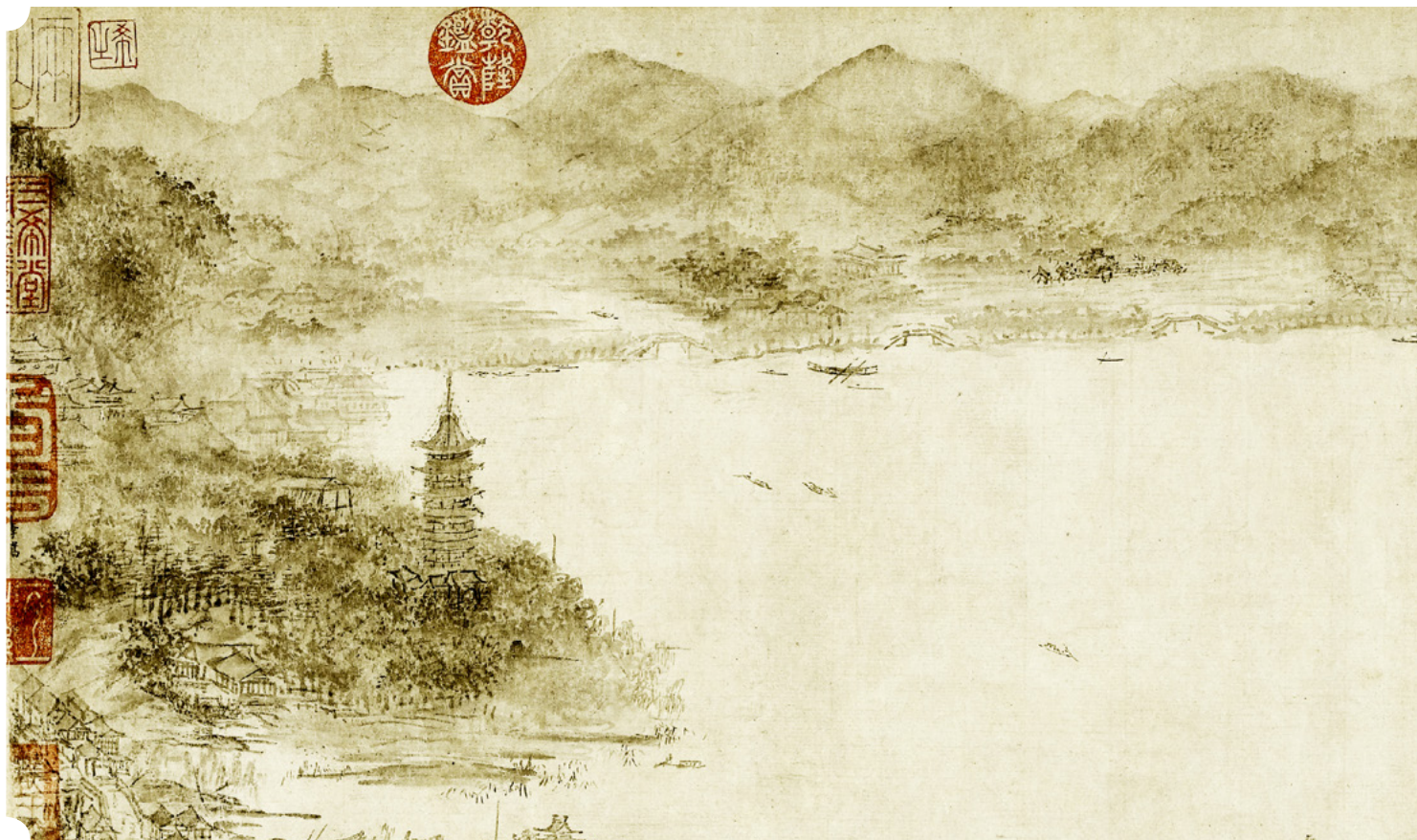
早期的如钟毓龙的《说杭州》，最有影响的如魏嵩山的《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提出的杭州城四边界线如下：“柳浦在今杭州城南凤凰山东麓，所谓‘依山筑城’，即依凤凰山筑城。以形势推断，其城范围，南起凤凰山，北抵今体育场路，东临东河，西濒西湖。”杭州学者王士伦《三徙治所、始建州城——

隋代杭州的建置及城垣范围》中持相似观点。

笔者认为这个观点都是有问题的，他们所讨论的这个大杭州城，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想象出来的杭州城，笔者称之为“大州城”。“大州城”之说其实与《旧唐书》的记载明显有矛盾。

对此，谭其骧很早就提出过质疑：“《元丰九域志》载隋杨素创建州城，周围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说恐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无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记》明说隋代依山筑城，足证城区限于凤凰山东、柳浦之西一带。”真是一语中的。

后来还有黄元寿提出过“隋代杭州存在着两个城”的观点，任肇时在硕士论文《南宋以前杭州城郭考》中明确提出了“隋代杭州筑有多城”：隋代杭州存在三个小城，分别是杭州州城、钱



塘县城、新城戍。

但这些怀疑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反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支持“大州城”的证据很充分很明确，怀疑派没有能做出足够的反驳。如黄元寿、任罕时都没有辩驳“三十六里”这个“铁证”，使得说服力不足。

二、铁证原来是个句读错误

支持“大州城”说的关键性证据，就是《临安志》中的“三十六里”的证据。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材料。

南宋临安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三部志书都记载了州城

部分，大同小异。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南宋临安两志》的标点如下：《乾道临安志》卷二《城、社（门附）》：《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东曰便门、保安、崇新、东青、艮山、新门；西曰钱湖、清波、丰豫、钱塘；南曰嘉会；北曰余杭。有水门五：东曰保安、南水、北水；北曰天宗、余杭。”

《淳祐临安志》卷五《城、社》记载稍有不同，但应该是抄自《乾道临安志》：古州域（域，当为“城”字之误。），隋杨素创，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两志都说这个记载来自《九域志》。宋代有两个《九域志》，查中华书局本1982版的当即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杭州”条下并无此条记载。但是《附录》部分，刊载的是《新定九域志》的古迹部分，“杭州”条下则赫然记载（见616页）：古州城，隋杨素创，见《图经》。这里的《图经》，很可能就是北宋的《祥符杭州图经》。

对照前面两部《临安志》，史源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来自《新定九域志》。而《新定九域志》是完全没提到“周回三十六里”云云。实际上《九域志》的作者也并不清楚隋杭州城



南宋李嵩《西湖图卷》

有多长，这里的“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云云，肯定不是指隋唐的州城，而是指宋朝的州城。隋唐的州城是子城，所以并不会有一如此之长的城墙；而宋朝的州城是罗城，自然有三十六里九十步之长的城墙。再回头来看《乾道临安志》的这段记载，其实本来应该是这样断句：《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

在“周回三十六里”前面，本来还应该加上两字“今城”，指明是宋朝城墙周长。方不至于让人误解。最正确的理解方式应该是这样的：《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今城）

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错误断句，把后面的文字，“周回三十六里”和“城门十二”都纳入到《九域志》的引文中，显然是错的。但这个错误不自现在开始，早从《淳祐临安志》的作者就开始误解了。

前引《淳祐临安志》中这段文字格式，稍微改了一下叙述方式，变成了“古州城，隋杨素创，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据《九域志》。”将引文出处《九域志》放到了后面，说明《淳祐志》作者就是按错误的断句方式来理解《乾道志》的，而《淳祐志》这

么一引一改，就将这个误读给坐实了。

自此之后，理解《乾道志》这段文字的人，都被牵着鼻子走，一错到底。包括如《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等等，都记载隋唐州城三十六里。断句之误，误人不浅。更有甚者，就如《乾道临安志》标点者一样，不少论著都将接着记录的宋代的十二个州门也理解为是隋代州城的城门，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经过这些辨析，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认为“三十六里”这条所谓的“铁证”，是站不住脚的，其起因，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句读之误，这一误已近千年。

三、杨素为什么要新修隋杭州城

另外一个原因导致认同“大州城”说的，则是来自一种常识上的误区。人们一般都会以后来的城市面貌去理解早期的城市面貌，比如州城总是比较大的，州城会将县衙包括在内，如后代所见的州城、府城、省城一样。所以，在钱唐门内的钱唐县县城，自然地被认为也肯定在州城城内，于是州城城墙就一直从凤凰山画到了霍山一带，于是隋代的杭州城就这样被自然地放大了。我们对“大州城”的存在深信不疑，而不会意识到，杭州州城可能是个小小的子城。

所谓子城，又称“内城”，子城（内城）和罗城（外城）相对而言。子城可以独立，也可以和罗城配套设置，一般罗城内包子城。子城和罗城的这种筑城模式，在魏晋隋唐时代，较为流行。子城相对是集中官员、军队，较为坚固；而罗城相应的就是集中居住普通平民。子城的面积，相对都比较小。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隋朝杨素建杭州城的过程，及其背景、时间、性质、目的等等，综合这些方面，可以证明，隋代州城不可能有三十六里这么长，也不需要这么长。

隋代州城是杨素修建的。但是杨素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呢？是在开皇十年（590）平江

南叛乱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战乱背景下修建的。

杭州城的修建时间，最多也只有一年。因为江南之乱爆发的时间，是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可以想象，杨素集结军队、平乱作战，到杭州城收复为止，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一个月左右吧？那么，杭州建城的开工时间，最快也只能从开皇十年（590）十二月开始。

而杭州城建好后，杭州州治迁入杭州城的时间，也就在修建的第二年，即开皇十一年（591），具体月份虽然不知，但即便算是在十二月吧，那距修建开始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一年整而已。

当然，一年的时间，如果征发夫役足够多的话，也是能建起一座大城的。不过，从开皇十年（590）十一月开始，到江南之乱的最后平定，当在开皇十二年（592）左右了。所以，整个杭州城建城的过程，全部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在此情形之下，大规模的征发夫役是基本不可能的。如果以较少数量的夫役，在一年时间内，来修筑达三十六里之大的城池，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杨素修杭州城的目的，基本上是由于军事目的。

杨素当年创建杭州城，只有一个地理坐标，那就是“柳浦西”，就是说，杭州城是在柳浦以西的

地方修建起来的。毫无疑问，杭州城与柳浦渡口关系非常密切。谭其骧也曾讨论过柳浦这个渡口的历史和在交通上的重要意义。而笔者认为，杨素在柳浦渡口以西建城，正是看中了此地有很高的军事价值——控扼住了跨越钱塘江的南北交通线。之所以判断说，杭州城最初就是杨素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首先就是因为，柳浦确实是一个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价值的津渡要地。柳浦，又称柳浦埭，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边，而隔江遥望的渡口则是西陵（今西兴）。柳浦——西陵，这是六朝时期跨越钱塘江南北的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作为一个渡口，首要的功能自然是交通。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渡口的军事功能非常明显。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柳浦之名，就是和一次战争有关。刘宋泰始二年（466年），宋将吴喜曾率众渡江追击叛军，“自柳浦渡，趋西陵。”正是利用了这条航线。

柳浦军事价值的第二点体现，是此地从刘宋文帝时候，就有驻军——新城戍。新城戍的具体地点现在尚未能很确指，不过在柳浦附近，当无可疑。新城戍的设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柳浦。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有一个精彩论断：“盖西陵在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

有事则为战争之冲，故是时戍主与税官并设也。”顾祖禹的这个“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的说法，完全可以同样地来评价柳浦的军事价值。实际上，新城戍的驻军在萧梁时期，多达五千人，这是个相当大的驻军了。这从侧面反映了柳浦这个渡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杨素自己也曾亲自指挥过一次渡江战役。开皇十年（590），杨素开始平江南之乱，其中最困难也最关键的一役正是渡钱塘江击败会稽高智慧的军队。当时高智慧的实力很强，尤其是水军，据说有“船舰千艘”，屯据了各个要害之地。杨素最后派出奇兵数千，乘小船数百，从侧翼偷偷渡江，击破高智慧在岸上的营垒。随后杨素再从正面发动大举冲击，这也打了整整一天，“自旦至申，苦战而破”。这次战役中，杨素水军主力在钱塘江边的屯扎所在，多半也应该是在柳浦。

经过这次苦战，让杨素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钱塘江的险要被南岸的会稽独占，如果发生叛乱，那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从军事制衡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在钱塘江北岸建立一个足以抗衡的重镇。这种在大江南北各设重镇，互相制衡的做法，不乏例子。就以唐代为例，在长江、运河这个要冲上，在北岸是扬州，在南岸则是润州（今镇江），扬州、

润州一直是唐代的军事重镇，设置都督。唐后期还分别是淮南道和浙西道的会府（一道的治所称“会府”）所在。之所以夹江设置两大重镇，首要目的就是互相制衡，保证运河南北航线的安全。

杭州城军事性的第二个体现，在于杭州城的建造特点，乃是“依山筑城”，就是倚靠着凤凰山筑城。依山筑城的军事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山本身是个很好的防御体。如南京城，被赞为“龙盘虎踞”，与这里有个钟山，关系至为密切。

杭州城依山而筑，是否确实有军事的考虑呢？刚好，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一个例子可以对照，这就是杨素在这时所建的另外一个新城——苏州新城。

根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说：“江左遭乱，（开皇）十一年，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东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杨素考虑到苏州城建在平地上，无险可守，故在苏州西南的横山脚下，建了一个苏州新城。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依山建城的军事优势。杨素新建苏州城和迁治，和他在杭州所做的完全一样。

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时杨素建杭州城时，一来这是他的计划，而非偶然行为；二来，他优先考虑的就是军事因素。

最后，我们之所以说杨素

建杭州城首先考虑军事因素，还可以通过一个侧面角度来证明。所谓的“大杭州城”，即今天杭州城南部这块土地。其饮水很成问题，一直到唐代建中年间刺史李泌导西湖水入城，才得以较好解决。“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从此杭州居民才开始逐渐多起来。

这个事实反过来告诉我们：隋朝初建时的杭州，人口必定稀少，不成规模。所以，杨素即便想造一个大杭州城，也没有必要将这块没什么居民的土地给包围起来啊？

四、隋城十里和宋城三十六里之别

目前研究中，隋代“大州城”最大的一个推算范围，也是北不过体育场路，东不过中河。而宋代的城墙范围是很清楚的，其北到今武林门，东到东河。所以，宋代城垣的范围，显然是远大于所谓的隋“大州城”的。两者必定不会同为三十六里，可以无疑。

隋杨素创建的杭州城实质是一个军事堡垒性质的子城，面积较小，周长当也不长。

其实，在修杭州州城的同时，杨素也下令修筑了南方好多个其它城池。如前引苏州横山山麓的新城外，还有会稽子城等。苏州新城大小不可知。会稽州城的大小，则有据可查。据宋代的《嘉

《泰会稽志》卷一《城郭》，下有“子城”条：“《旧经》云：子城，周十里。……熙宁中，沈立为《越州图序》云：杨素筑子城十里。”可知，隋越州州城为“子城”，方圆“十里”。

隋代的杭州州城，到底有多长呢？直接的数据目前找不到。不过可以通过曲折的方式来推断。隋代州城，到了唐代依然是州城，到吴越之后，则成为吴越国的王宫所在，也称“子城”。到北宋时，又再成为杭州州治所在。而到了南宋时，州治子城就变成了临安皇城（或称大内）。虽然其间会有修补增减，但大致应该是一直沿袭的。也就是说，南宋皇城的范围，大致应该相当于隋杨素所修的州城。而南宋皇宫城的大小，据陈随应《南渡行宫记》中提到了“皇城九里”。据此我们可以反推：大概隋代杭州州城差不多是九里左右。这个数字，是和隋时会稽城“十里”差不多。

现代的考古发掘报告，也给出了差不多的数据。唐俊杰、杜正贤的《南宋临江城考古》详细描述了南宋皇城的四面城墙，这个范围，周长差不多也是十里左右。可与文献相印证。

我们前面提到，“三十六里九十步”前面，可加“今城”二字，也就是说，三十六里这个数字，乃是宋代州城的周长。

其实可以根据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来判断：那就是宋代的文献为什么只记载隋代州城，而不记载宋代州城的长度呢？这不太合理吧？所有宋代的记录中，关于杭州州城只有一个数值——“三十六里九十步”。如果这个数值是隋州城的长度，那宋州城肯定要比这数值大不少。但何以宋代的文献只记录了隋代州城长度，而不记载宋代州城的长度呢？这是因为从《淳祐临安志》开始，人们不自觉地认为隋朝州城和宋朝州城是一样的，这个数据无意中既当作隋代数据，也当作了宋代数据。人们并没有去质疑这中间的矛盾。而到了今人，却更盲从文献记载，也一样忽略了这个很明显的问题。

证明宋代州城的直接证据，就这样“被消失”了。不过，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宋代州城的周长。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明清的杭州城与宋代杭州城做一比较。《民国杭州府志》卷五说：“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这个杭州府城，是明清两代的杭州府城。明清杭州城基本沿袭了元末张士诚建造的规模。这次修整调整有变化，主要是南边缩，东边扩。将宋、元两个州城叠加起来看，虽然位置有差异，但大致可以看得出，相差不大，而宋城似乎略大一点。所以，如果明清杭州城有三十五

里之数的话，那么宋代州城有三十六里之数，也就很可信了。

换句话说，如果隋代杭州城也有三十六里的话，岂非和明清城差不多大了？而现代主流观点对隋代杭州城的四面城墙位置推测，是远不足这个数据的。这更加可以反证隋代州城三十六里不可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整个隋唐时期，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包囊钱塘县在内的大杭州城。隋唐杭州城只是个小小的子城，在凤凰山脚下，和钱塘县城相隔甚远，形成了双城对峙的局面。而真正的大杭州城，是直到钱镠时代才开始修建的“罗城”。自此，我们今天理解的杭州城，或者说人们想象中的“大州城”，才真正地出现在杭州这块土地上。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方志讲堂

HANGZHOU YUEZHI
第三部分

责任编辑：马琦敏

“官不修衙而修志” ——毛泽东对地方志 的重视及其启示

□陈东林

地方志详细记述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资料。毛泽东主席尤其重视地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经常搜集阅读、活学活用，并倡议全国编修地方志，推动了新中国方志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段段富有启迪的佳话。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一、“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很多地方志书。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已熟读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輿纪要》。这是两部具有地方总志性质的书籍，前者除记载舆地沿革外，对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的辑录尤其详细，并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后者重在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毛泽东尤为推崇顾炎武的治学方式，认为顾炎武对“事关民生国民（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之余，不顾饥困疲乏，广泛搜集地方志书来细细阅看。每到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1929年，毛泽东率红军来到兴国县城后，就乘隙专心致志地看起《兴国县志》来。红军到达瑞金后，毛泽东又托人找来《瑞金县志》。这部《瑞金县志》编于清代乾隆年间，共八卷，当时缺一卷。毛泽东视若珍宝，把它置于案头，时时拿起研读一番。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又阅读了《遵义府志》《仁怀厅志》《赤水县志》等方志。

长征路上，在一次胜仗之后，毛泽东跑去问他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小黄，有什么战利品没有？”黄友凤连忙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忙说：“不是这个！”看着一脸不解的黄友凤，毛泽东笑道：“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黄友凤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以后，每到一处，身边的工作人员必定为他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走的地方多了，搜集到的地方志书也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毛泽东只得抽空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对于这些在战争环境中不得不扔掉、以便轻装前进的志书，毛泽东念念不忘，心痛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阅读地方志书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无论“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1952年10月底，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徐州视察。在市政府招待所（花园饭店），毛泽东问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他面前。毛泽东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大家听了，都为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惊叹不已。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到了合

肥，毛泽东就调阅了《安徽省志》和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1965年5月下旬，72岁高龄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茶陵时住了一晚。毛泽东故地重游，格外兴奋，提出要看茶陵县志。县委副书记李颖报告说：

“茶陵未修县志，现存的最后版本只有清同治九年（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毛泽东说：“不管是县志还是州志，都想看看。”于是，李颖便拿来了《茶陵州志》。这天晚上，毛泽东一直阅读到凌晨三点才就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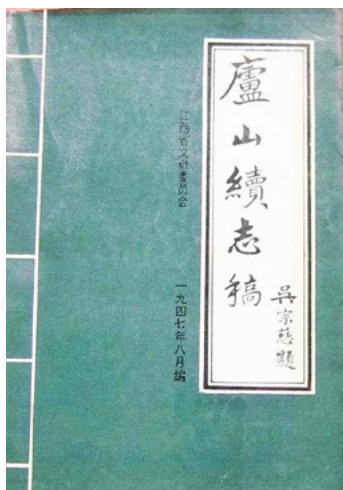
二、“这部续志稿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

毛泽东活学活用地方志，常常在工作和生活中加以引用论述，作为领导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重要参考。早在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任务之一是“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从1953年到1975年，毛泽东多次到杭州考察，每次都要查阅地方志书。1957年，毛泽东到杭州时提出，浙江要编写乡

土教材，要让大家懂得本地的地理和历史、过去和现在。毛泽东风趣地说：“小孩子总是先叫爸爸妈妈，后叫爷爷、奶奶、叔叔、伯伯的嘛！”。毛泽东常常引经据典，纵论古今，与地方上的同志谈笑风生。有一次，毛泽东问浙江歌舞团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听说是“浙江海宁硤石人”时，毛泽东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硤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旨在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期间，毛泽东借阅读民国年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之机，阐发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工作方法和治学态度。毛泽东说：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往访，只剩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他对在场的周小舟等同志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毛泽东称赞《庐山续志稿》说：“这部续志稿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



《庐山续志稿》

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滞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1960年10月，毛泽东到湖北考察。他在读完乾隆年间和道光年间编纂的两部《荆门州志》后，对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州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这反映出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第二，我发现荆门州志书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3年一中旱，5年一大旱。你到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位置上。第三，

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

三、“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阅看地方志，还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看看当地的方志书籍。据薄一波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看一看当地的地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

1955年11月，毛泽东南下去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途经上海巡视黄浦江时，毛泽东询问陪同的上海干部：“上海有个下海庙，你们知道吗？”在场的干部你看我，我看你，无人能答。后来查阅《上海县志》才知道，下海庙原名“夏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俗传“夏海庙”供奉海神为义王，故又称“义王庙”。因沪语中“夏”与“下”同音，加上该庙位于下海浦边上，故后人就将“夏海庙”改称为“下海庙”。

大家不禁为毛泽东的博学多识所深深折服。

庐山会议期间，工作人员除借来《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外，还借来清代《临川县志》《铅

山县志》，以及《临川四梦》《桃花扇》等书籍。

毛泽东看到这些书后，高兴地讲起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到南康任职，治所就在庐山脚下的星子县。朱熹走马上任，当地官员纷纷到轿前相迎。朱熹下轿便问：“《南康志》带来没有？”众人面面相觑，无以为答。

毛泽东接着说，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在我国“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成了后人“以志呈阅”的惯例。今天我们也应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嘛！

四、“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毛泽东提倡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做好新中国的方志编修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方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找人从四川省图书馆借来《四川通志》《蜀本纪》《华阳国志》，后又找人要来《武侯祠志》《灌县志》《都江堰水利概要》等志书。毛泽东对每一部志书都认真阅看，并用红蓝铅笔在书上圈、点、批、划。毛泽东亲自挑选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的部分内

容一并印发与会人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

1960年10月考察湖北时，毛泽东特别叮嘱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要修地方志。毛泽东问梅白：“你这个县委书记如何当法？”当听梅白说没有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基层县级领导干部工作经验后，毛泽东就风趣地讲起“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接着又说：

“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要先知道荆门市志。”毛泽东又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热心修志的现象，说：“‘官不修志而修衙’，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

在毛泽东主席关心下，修志工作迅速打开局面。周恩来总理多次强调要搜集和编修地方志，董必武副主席亲自指导推动湖北省地方志编修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地方志小组成立，负责推动全国修志工作。

1960年，全国共计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个县开展修志工作，其中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四川等省和北京市走在前列。毛泽东倡修地方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三点启示

毛泽东主席率先垂范关心方志事业，活学活用方志书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地方志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书。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领导地方志工作，把中国悠久的方志文化继承好、发扬好和利用好。

二是要活学活用方志书籍。地方志具有地方性百科全书特质，其记述纵贯古今，涵盖各个领域，是了解一地之人事物的权威著述。阅读方志书籍，做到学以致用，从中了解一地之经济物产、区划沿革，领悟一地之人事变迁、治乱兴衰，以便更好地推进当前的中心工作。

三是要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当前，修志工作者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总结方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不断进行篇目创新、体裁创新、内容创新，使所修志书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原文载《北京地方志》2020年第2期）

方志 动态

HANGZHOU YUEZHI
第四部分

责任编辑：王惟惟

上级动态

全国方志馆建设研讨会、全国方志馆业务培训班、全国方志馆讲解员业务培训班、国家方志馆分馆建设研讨会在河南焦作举办

□摘编自中国方志网

11月24—27日，全国方志馆建设研讨会、全国方志馆业务培训班、全国方志馆讲解员业务培训班、国家方志馆分馆建设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办。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党组书记、方志出版社社长高京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指办纪检组组长、副主任叶聪岚主持会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学东，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管仁富出席会议并致辞，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焦作市委常委、秘书长牛炎平，焦作市副市长薛志杰出席会议。

高京斋分析了今后全国方志馆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机遇、问题与瓶颈，提出了全国方志馆建设的重点任务。赵学东介绍了河南省高度重视史志工作情况。管仁富介绍了河南省各级史志部门推进方志馆建设情况。王小平介绍了焦作市情和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建设情况。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大局，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向，进一步明确方志馆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明确方志馆应有的责任、担当，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三大功能定位，树立信心，创新思路，挖掘潜力，塑造出新时代方志馆建设的新形象、新风采。要正视差距，准确把握当前方志馆建设薄弱环节，认真加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方志馆

上级动态



11月24—27日，全国方志馆建设研讨会、全国方志馆业务培训班、全国方志馆讲解员业务培训班、国家方志馆分馆建设研讨会在河南焦作举办

建设顶层设计、理论研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切实坚定方志文化自信，努力提升方志文化素养，积极探索方志馆发展理念，做好先进典型培树工作，做到全国一盘棋，努力开创新时代方志馆建设新局面。

研讨培训期间，山东省东营市、云南省楚雄市、广东省中山市南区街道、河南省宝丰县、江苏省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等9个单位先后做大会交流发言。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齐吉祥、中国国家博

物馆研究馆员李莎、故宫博物院展览形式设计师于彤、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名誉馆长刘树新先后授课。并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国家方志馆中原分馆方志文化教育基地、新郑市城市展览馆、新郑市孟庄镇方志馆开展现场教学。

此次会议由中指办、国家方志馆主办，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焦作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协办。来自全国地方志系统以及部分市县党委政府的代表参会。

■ 第二届“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在杭州举办

□摘编自中国方志网

11月16日，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共同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第二届“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在杭州举办。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盛世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民荣，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院长程中才，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左健伟，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潘捷军

出席论坛并致辞。

本届论坛以“长三角一体化和方志数字化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学习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精神，集中展示三省一市地方志机构响应《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的措施与成果，探讨地方志系统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更好地开发利用史志成果，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更加精准、便捷、多元的资政服务。

上级动态



11月16日，第二届“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在杭州举办

盛世豪在致辞中强调，地方志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聚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力量，为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他指出：地方志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地将数字技术、数据信息与方志的编撰和运用结合起来，把地方志打造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以方志文化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后，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社会发展组组长傅晓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特约报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汇报“长三角地情资料库及统一发现系统项目建设方案”。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地方志工作机构介绍各省方志数字化、信息化工作发展情况。

本届论坛还组织召开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志》（暂名）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洪民荣主持下，

编委会探讨共同挖掘长三角区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历史，记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

在编委会会议召开的同时，上海市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金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等来自三省一市地方志机构的市（区）、县（市、区）代表围绕史志“互联网+”工作模式、地情资料库和网站建设、数字方志馆开发、方志数据库互联互通与共享、方志资源与文化多元传播、数字人文与地方志、志鉴编纂信息化系统介绍、编纂方志数字化转型路径等内容展开交流。

洪民荣在闭幕式上做论坛小结时指出，三省一市方志人应协同合作、取长补短，为推进一体化做出应有贡献。论坛同时商定2021年论坛将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来自三省一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等80余人参加论坛。

上级动态

《浙江通志》编纂告竣

□摘编自中国方志网



《浙江通志》第十三次终审会召开

11月10日上午，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召开《浙江通志》第十三次终审会，《浙江通志·总述》等11卷志稿在会上通过终审，标志着《浙江通志》编纂任务的全面完成，其工作重心由编纂转入出版。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形成了志书编纂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自清雍正年间编成《浙江通志》280余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浙江通志》均未最终编纂完成。2008年底，在部署文化大省建设发展战略时，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浙江通志》，并于2011年9月发文启动该志编纂工作。

《浙江通志》共113卷，约1.2亿字。11年来，参与《浙江通志》编纂的相关人员达14200余人，共收集各类资料8.8亿多字，制作资料卡片23.3万余张。《浙江通志》全体编纂人员面对志书记述时间跨度长，资料收集难度大，编纂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等现实问题，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事业心、责任心，按照《浙江通志》总编俞文华提出的“不忘初心担使命，拼尽心力铸精品”的要求，高标准做好《浙江通志》编纂工作。

《浙江通志》记述了上至事物发端，下至2010年浙江省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历程与巨大成就，特别是重点记述了浙江作为“三个地”（即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丰富内容和“八八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浙江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引领。《浙江通志》既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浙江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丰硕成果。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袁家军在该志序言中指出：“《浙江通志》的编纂出版，既可以激发当代浙江人励精图治、团结奋斗，更能够广泛宣传浙江，让全国乃至世界更加充分地了解浙江、认识浙江，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据了解，《浙江通志》已有部分卷陆续出版，并将于2021年全部出版。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还向省档案馆移交了全套《浙江通志》终审稿，作为珍贵档案永久保存。

市级动态

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锦利一行到杭州考察交流工作

□ 骆小峰

11月4日下午，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锦利等一行6人到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考察交流党史和地方志工作。

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主任郎健华介绍了我室机构改革有关情况，以及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资政研究等我室的特色工作。

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副主任蒋文欢介绍了“志、鉴、书、刊、馆、库、网、研、学（会）、用”等“十位一体”工作体系的建立、工作链的打造、方志文化六大工程的实施等情况。

高锦利介绍了机构改革的情况、推进村镇志编纂的经验、专题口述的特色工作、红色纪念场馆的



11月4日下午，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锦利一行到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考察交流党史和地方志工作

建设等情况。最后，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好的经验与做法，共同促进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11月5日上午，高锦利一行参观了杭州党史馆（方志馆）北山馆区。

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 楼秀文

为统筹推进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着力加强红色资源挖掘、保护、展示和传播，进一步规范党史教育基地的运行与管理，充分发挥党史教育基地



11月19日，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的作用，11月19日，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组织召开了全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

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主任郎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在充分肯定全市党史教育基地在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尤其是在“不忘初心”主题教育中的特殊作用的同时，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守住意识形态阵地。建立展陈内容、讲解词的审查机制，把好“政治关”。二是要立足特色、讲好故事。不求“大而全”，立足各馆特色，利用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把故事讲生动，让群众喜闻乐见。三是要经常性开展纪念活动，扩大社会

市级动态

影响力。规模较大的场馆可自行策划，规模有限也可多家联动、资源互补、成果共享，形成“以点串线、以线带面”的效果，要让红色资源“热”起来、“靓”起来、“活”起来。四是要加大投入，提升场馆展陈水平。根据《杭州市革命文物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程（2019-2022年）实施纲要》要求，各类红色场馆的展陈应当根据时代变化适时调整，“五年一小动、十年一大动”，展陈及时更新提升。做好人员稳定、经费保障等工作，推动全市红色资源的整体提升、整体利用。

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副主任蒋文欢主持会议并小结。她强调，杭州作为“三地一窗口”的省会城市，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方面理应走在前列、创造经验、作出示范。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起点，

站在“十四五”即将开启之年，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必须提升新高度、开辟新境界。不仅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不仅要做好红色文化的展陈，更要抓住红色资源的灵魂，深挖精髓要义、揭示时代价值；不仅要彰显红色资源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教育价值，更要放大它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品牌价值；不仅要把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作为党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载体，更要与政治、经济相结合，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不仅要做好每个红色资源点的挖掘、整理、展示和利用，更要变分散为聚合，变单向为互动，变凝固为活态，激发红色资源的生命力，使其焕发出激励奋进的强大力量，让党和国家的事业在史志篇章中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文胜一行到杭州考察交流工作

□马琦敏

11月3日下午，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文胜一行到杭州考察交流地方志工作并赴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杭州市方志馆）望江馆区参观考察。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副主任蒋文欢等陪同。

随后，双方在资政堂进行交流座谈。蒋文欢就机构改革情况、杭州市方志馆的功能定位和展陈设计、杭州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地方志编研等情况做了详细介绍。王文胜对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富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分享表示感谢，认为杭州市方志馆很好地展现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和发展现



11月3日下午，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主任王文胜一行到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杭州市方志馆）望江馆区参观

状，对展示地情资源、普及和宣传方志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这次交流沟通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受益匪浅。王文胜主任还将刚刚出版的《温州市志》赠送给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

市级动态

■ 河南省禹州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郑锴一行到杭州交流工作

□马琦敏

11月4日上午，河南省禹州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郑锴一行4人到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杭州市方志馆）望江馆区参观，详细了解方志馆建设工作。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副主任阮关水等陪同参观。

郑锴一行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认真参观了方志馆各个展厅，对杭州市方志馆的展陈内容、展陈手段、细节处理及展陈效果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郑锴一行到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座谈，交流年鉴编纂与创新工作的先进经验等。两地同行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保持紧密联系，共同促进地方志事业的交流和发展。



11月4日上午，河南省禹州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郑锴一行到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杭州市方志馆）望江馆区参观

■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一行到杭州座谈

□骆小峰

11月9日上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一行2人到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就推进西湖会议研究等进行座谈。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一级巡视员曾林平，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吴汉全，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室副主任应革新和有关处室负责人等参加。

朱善璐认为，杭州在推进西湖会议和李大钊研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仍显零碎，不够系统。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他希望与浙江及杭州一起集中力量进行研究，把西湖会议和李大钊在浙江及杭州的研究空白点补齐，以进一步弘扬先烈精神，传播红色文化。



11月9日上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一行到杭州座谈

座谈会上，大家就如何推进相关研究，特别是省、市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加强合作等事宜达成了初步意向和共识，表示要加强联系，精诚合作，深入研究，以期在西湖会议和李大钊在浙江及杭州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

区县动态

挖掘历史，品味萧山——《萧山记忆》（第十一辑）出版

□萧山区委党研室（区志办）孙淑桢

近日，萧山区委党研室（区志办）编辑的《萧山记忆》（第十一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萧山记忆》（第十一辑）约12万字，设史海钩沉、湘湖史话、乡贤佳话、姓氏谱牒、耕读传家、朝花夕拾、古镇揽胜·所前7个栏目。

作为连续性出版物，《萧山记忆》集资料性、学术性、通俗性为一体，旨在挖掘萧山、解读萧山、品味萧山，是普及和挖掘萧山历史文化、宣传和弘扬萧山人文积淀的窗口。



《萧山记忆》（第十一辑）正式出版发行

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讲解员培训顺利举办

□余杭区党史办 唐晓远

11月30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由余杭区史志办、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主办的2020年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讲解员培训在余杭党史馆顺利举办。来自红色联盟各成员单位红色资源点的25名讲解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是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循·初心”“六个一”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之一。区史志办副主任蒋旭东在开班动员讲话中阐述了讲解工作在推动红色基因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即纽带作用、信息反馈作用和展示宣传作用），并希望红盟、红色资源点和讲解人员三方齐心协力提升讲解服务质量，并对学员提出了殷切期望。

第一批“循·初心”“红色故事我来写”和“红

色故事我来拍”优秀作品名单随后公布。

本次培训分成党史知识、学员代表讲“红色故事”和讲解员基本素养三个专题，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理论培训和工作实务指导相结合，代表交流和现场点评相结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针对性和实践性。通过此次培训，为进一步提升讲解员的理论水平和讲解业务能力提供了助力。



11月30日，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讲解员培训顺利举办

区县动态

《富阳年鉴（2020）》出版发行

□富阳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 刘亮

近日，由杭州市富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富阳年鉴（2020）》经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自1996年开始编纂《富阳年鉴》以来，连续出版的第25卷富阳综合年鉴。

《富阳年鉴（2020）》采用分类编纂法，以类目、分目、条目3个层次为框架结构。卷首设特载、年度聚焦、大事记、区情综览，全书共设35个类目，275个分目，1793个条目，共92.5万字。全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富阳区人民在2019年勇于开拓创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中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以及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富阳年鉴（2020）》首次采用全彩印刷，所录文稿大部分由富阳区各部门和各乡镇、街道提供，部分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和有关人员撰写。先后进行5轮编校，框架体例相比往年



《富阳年鉴（2020）》出版发行

又有新的调整，首设富阳荣誉、数字富阳版面，编纂内容、装帧、印刷质量焕然一新、明显提高，有效地发挥方志著作“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功能，为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政务接待、对外交流和文化宣传提供方志依据，为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提供史志力量。

《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再版发行

□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 刘金炎

11月12日，随着建设浙江大花园——十大名山公园走进天目山暨“满贯跑”首发活动的举行，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也再版后正式对外首发。

《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编纂工作启动于2012年，经过5年多时间的精心编纂，2017年由省方志办负责正式出版。为满足临安工作需要，由

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牵头，经请示省方志办同意，对原《天目山专志》全彩印刷后再版发行。全志共9章44节61万字，内容上上天目山历史发端，下至2010年，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天目山发展历史和保护现状，重点突出天目山丰富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使之成为人们了解天目山、热爱天目山的首要参考资料。

区县动态

《浙江通志》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工程，由省长担任《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主任。113卷中，仅有山志两部，一部天目山，一部雁荡山，可见天目山在全省的影响。编纂过程中，有关工作得到了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徐立毅的批示肯定，时任临安市委书记张振丰也多次肯定修志工作，表扬修志单位是“小单位、大作为”，《天目山专志》编辑部也连续3年被评为《浙江通志》创优工程编纂工作先进单位。正是在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关心支持下，《天目山专志》成为《浙江通志》113卷中第一家通过初审、出版，在第一批出版志书中抽检质量最高的志书，成为《浙江通志》编纂样板卷、精品卷。



《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再版发行

《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天目山名山公园建设，更推动临安地方志事业朝追求专业、服务现实的方向努力迈进。

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会长王守亚到临安调研

□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 彭铖



11月4日，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长王守亚一行到临安调研

11月4日，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长王守亚一行，专程到临安调研临安年鉴编纂出版工作，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方英儿介绍了本区近年来方志工作的开展情况并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议年鉴评审工作尽量向基层倾斜，进一步提高基层年鉴编纂工作的积极性和社会影响力；二是建议多举办年鉴编纂业务培训活动，提高年轻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兴趣，同时，邀请中国版协到临安举办业务培训班和编纂经验交流会。

王守亚充分肯定了《临安年鉴》近几年的编纂出版工作。他指出，《临安年鉴》多年来注重编纂质量，编纂内容兼顾规范与创新，品牌创建双效并举、成果突出，队伍建设高素质、高能效，编辑出版的《临安年鉴》质量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全国许多地方在学习《临安年鉴》编纂经验，在全国已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最后，他希望《临安年鉴》今后不断提升编纂创新能力，继续保持全国标杆地位。

杭城 新事

HANGZHOU YUEZHI
第五部分

责任编辑：马琦敏

杭州营商环境位列全国第一

11月1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结果显示，杭州在营商环境城市排名中获全国第一，成为“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这是继今年入选《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全国第五“标杆城市”之后，杭州营商环境获得的又一殊荣。从公布情况来看，杭州在要素资源保障、市场环境及创新环境优化等方面受到了民营企业的高度认可。



全国首个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在余杭揭牌

11月3日，在2020年中国服务型制造大会上，由国家工信部和浙江省共同推动建立的全国首个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在余杭正式揭牌并启用。这个服务型制造研究院位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9+X模式建设若干行业亟需的模式应用验证或技术创新实验室，目前已启动建设产品服务系统（全生命周期模式）、绿色制造（节能环保服务模式）、医工交叉（工业设计和定制化模式）三个方向的实验室。



杭州开通全国统一的儿童救助保护热线



今年8月，杭州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统一的“12349”儿童救助保护热线试点地区之一。11月3日起，杭州市正式开通24小时儿童救助保护热线。市民可通过拨打“0571-12349”接通热线，热线为全市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六大类咨询服务。杭州市“12349”儿童救助保护热线是一个“一站式”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热线服务综合平台，采用“一号对外、集中受理、分级处理、限时办结、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接待中心设置在市儿童福利院（市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内，主要负责热线的受理、督办和反馈等工作，分线设置在各区、县（市）民政部门及公安、教育、司法等与儿童福利密切相关的部门。

2020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暨城市市长论坛在杭州召开

11月4日，2020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暨城市市长论坛在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召开。本次会议以“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传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杭州、北京、厦门、南京、曲阜等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领导出席城市市长论坛，分享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其间，2019年度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优秀监测年度报告出炉——良渚古城遗址、江南运河杭州段（含浙东运河杭州萧山段）遗产地双双获奖。另外，为创新遗产治理，履行国际公约，会上还发布了良渚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遗产大脑”。



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学院开学



11月5日上午，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学院正式开学。通过层层选拔，共有100名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15所高校的同学入选，他们将参与从理论到实操的专业培养全过程，努力成为跨境电商领域专业人才。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学院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钱塘新区共同创办，为国内首家服务“一带一路”、汇集全省中外学生的跨境电商精英学院，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微专业培养模式，学制一年，集中安排在双休日或短学期组织教学，学分修满的学生可颁发浙江工商大学跨境电子商务微专业证书。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国际人才中心揭牌

11月6日，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国际人才中心正式揭牌并启用，自此填补了开发区为海内外人才服务的平台空白。该国际人才中心设立创新创业服务区、人才配套服务区、产业培育发展区三大核心功能区。其中，创新创业服务区设有人才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服务窗口、人才信息化服务平台等；人才配套服务区设有会务培训平台、国际人才交流合作中心等；产业培育发展区集聚了优质人力资源等服务机构。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国际人才服务中心的启用，将进一步提升开发区聚集人才的吸引力度与服务人才的质量水平，成为人才在钱江经济开发区创业的家園。



2020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



11月8日上午,2020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大会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才线上线下参会,67位海内外院士出席。会上举行世行全球数字金融中心(杭州)、欧盟研究与创新杭州中心揭牌仪式,发布杭州人才码国际版。其间,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10项相关活动,包括2020中国留学生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创客天下·杭向未来2020杭州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揭榜挂帅发布路演、长三角区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长三角人才云市场高层次人才招聘大会、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创新路演等。杭州连续十年成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2020 世界健康大会在杭州召开

11月8日,2020世界健康大会在杭州召开,主题为“数字健康,科学防疫——担当循环发展,共生同命的新使命”。大会采取线上直播联动和线下现场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国际国内的400余名嘉宾云集现场,从数字健康、科学防疫等不同维度出发,分享各自经验,为共同面对下一步疫情形势出谋划策,为今冬明春防疫提供“中国方案”。大会现场,还对疫情期间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团体与企业进行了表彰。



2020 天猫双 11 全球狂欢季成交额 4982 亿元



截至11月11日24:00,2020天猫双11全球狂欢季成交额为4982亿元。超450个品牌成交额过亿,31766个海外品牌参加,105个产业带成交额超1亿元,210万线下小店参与,覆盖1406个县域的41万款农产品,38万个来自贫困县的店铺参加,AI调用量超15万亿次……今年的天猫双11从“光棍节”变身“双节棍”,售卖周期提前到11月1日开始,形成了更长周期的消费爆发。4982亿元的成交额数字表明,中国市场的巨大内需动能,数字化带来的创新红利,带动天猫双11实现新增长。

淳安下姜村入选全球减贫案例

11月13日,2020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在萧山开幕。大会以“信心与变革——面向未来的旅游业”为主题,共同为后疫情时代旅游业的恢复振兴出谋划策,也向国际业界和从业者传递更多信心与力量。大会发布的《世界旅游发展报告2020:市场复苏的信心与产业变革的挑战》中也提到,数字化和新基建等奠定了旅游业产业发展新动能,并点赞“杭州发布数字经济旅游十景”等旅游业新举措。当天,世界旅游联盟也联合世界银行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同发布《2020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杭州淳安下姜村等41个优秀案例入选。



2020 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暨第八届中国电视产业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11月14日，2020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暨第八届中国电视产业推介会在杭州西湖区开幕。本届峰会以“拥抱全媒体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共同聚焦电视剧内容创作，探索创新、分析趋势、交流观点，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为电视剧和电视文艺创新注入强劲活力。会议期间举办多个高层次论坛，响应不久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这一对文艺创作的更高要求。开幕式上，历时近两年筹备与开发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中国（浙江）影视国际产业合作区十诺影视云交易平台正式上线。

杭州首批“城市青年音乐角”启动

11月16日晚上，杭州市首批“城市青年音乐角”率先在下城区的西湖文化广场和新天地活力Park同时“点亮”。今后，这些“城市青年音乐角”将以“周周有表演”为目标，为年轻人打造一个开放互动的音乐舞台。下城区作为全市“城市青年音乐角”试点城区，将在辖区内青年集聚或人流量大的地点，率先推10个不同音乐风格的“城市青年音乐角”。这些青年音乐角将与下城区文旅线路深度融合，以构筑全国时尚文艺高地为目标，同步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2020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在杭州举行

11月18日，2020中国幸福城市论坛暨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揭晓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杭州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座连续14年获此殊荣的城市，同时还获得了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和组委会特别奖——新时代数字治理标杆城市。与此同时，中国幸福城市杭州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新消费·醉杭州”2020 杭州休闲购物节启动

11月19日晚，“新消费·醉杭州”2020杭州休闲购物节启动暨杭州中国丝绸城省级高品质步行街开街仪式在杭州中国丝绸城举行。本届杭州休闲购物节突出创新性和互动性，将整条中国丝绸城省级高品质步行街延展为活动的舞台，移步换景，围绕“新消费”的内涵，全面体现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充分展示“醉杭州”的魅力。自2020年11月19日起至2021年1月，各区县（市）及各相关行业协会、广大商家积极参与，将组织近120项活动，打造一场跨年度的新消费嘉年华，进一步拉动和催生杭州消费的内生动力，激发新消费潜力、繁荣新消费市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杭州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11月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杭州市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建德市首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明办还对复查测评成绩靠前的33个全国文明城市（区）进行了通报表扬，杭州市、桐庐县位列其中。创建巩固文明城市，杭州一直在路上。再一次站在新的起点，杭州市满怀信心，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全市人民力量，不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杭州开出首家“跨境新零售店”

11月24日，首个“跨境新零售店”在杭州下沙正式开业，消费者可以在店内挑选体验、扫码下单，享受保税仓专线配送、20分钟极速达的新购物体验。这是杭州市政府、杭州综试区通过政策以及监管创新，结合天猫国际跨境供应链能力，在国内首创的“保税展示+新零售”模式。这家跨境新零售店位于杭州下沙银泰商场的盒马鲜生内。一期占地超300平方米，开店首日主打美妆个护、营养保健、日用百货和母婴用品等60多个进口品牌130多种爆款商品。



富阳获评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



11月24日，在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上，11个县（市、区）作为2019年度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受到表彰，富阳是杭州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区）。为加快全域景区化联动发展，富阳把全区24个乡镇（街道）划分为味道山乡六大比武组团，组团推进、错位发展。围绕“百花百村·百村百味”主题，通过打造“我在富春山乡有个家”结亲、味道山乡游、田园餐桌、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等系列品牌，集聚乡村人气，今年以来全区实现乡村旅游收入6.76亿元。

首届世界会长大会在杭州召开

11月27日，首届世界会长大会在杭州隆重召开，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关键时期，200多名海内外商协会会长、组织精英齐聚钱塘江畔，共议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提出了用心涵养新生态、全力培育新经济、大力布局防火墙、构建命运共同体。此外，在首届世界会长大会暨第11届西湖公共关系论坛中，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税根发布2个榜单：“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市”与“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杭州荣获 2020 中国最佳促进就业城市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也让稳就业、促就业工作面临挑战。大疫即大考，杭州自有答案。面对这场大考，杭州坚持夯实民生之本，助返岗、稳存量、拓增量，交出了就业“大考”之下，具有杭州特色和民生温度的高分答卷——11 月 27 日，在 2020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典上，杭州荣获“2020 中国最佳促进就业城市”。同时入选的还有深圳、南京、青岛、武汉等城市。此外，活动现场还揭晓了中国年度最佳雇主 30 强。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杭州企业获得中国年度最佳雇主 30 强称号。

2020 杭州（国际）影响力投资大会召开

11 月 28 日，2020 杭州（国际）影响力投资大会在浙江展览馆开幕，进一步探索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大会通过展播首部中国影响力投资纪录短片——《寻找中轴线——2020 中国影响力投资观察》，发布全国首份《中国影响力投资主题图谱》，以及开展浙商、女性和残障人士三大板块专题演讲，由众多投资者、实践者在现场分享他们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观点和思考等形式，力争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国内影响力投资生态。



《共产党宣言》系列版本捐赠仪式在杭州举行



11 月 28 日下午，金亮先生《共产党宣言》系列版本捐赠仪式在杭州文澜书院举行。作为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亮先生曾先后多次捐赠古籍，支持公藏单位的藏品建设。本次向浙江省委宣传部捐赠 1140 多种系列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包括了 1888 年至今全世界出版的多语种版本。其中，1888 年英文版是经恩格斯校注的早期珍稀版本，全世界存量极少。在建党 100 周年到来之际，这笔特殊捐赠不仅是非常宝贵的红色教育资源，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

杭州联合银行成功发放全国首笔“创新积分贷”

近日，杭州联合银行在申请企业无抵押、无担保的情况下，成功向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发放全国首笔“创新积分贷”302 万元。杭州联合银行“创新积分贷”基于杭州高新区（滨江）在全国率先试点推动的“企业创新积分”评价体系。这套体系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评级标准进行分级分层评价，量化评价企业创新能力，构建企业创新画像，为科技企业增信。杭州联合银行作为合作银行，根据“企业创新积分”对处于不同阶段企业的指标、权重差异赋权，自动生成授信额度，专人专线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与综合金融服务。



◆◆
杭州首发十条『城市记忆』主题文旅线路产品
◆◆

11月17日，2020年“城市记忆工坊”杭州区县（市）推广季活动正式启动，89项共计890个免费非遗体验名额、线上线下文旅产品展销活动以及全国首推十条“城市记忆”主题文旅线路产品，从老皇城根出发，辐射各个区县（市），经过杭州文史学家等“城市解读人”的重新调研、解读，邀您一起来“走读”，为老地标挖掘更多新故事。



十条线路分别为：

北山探秘：北山怀旧，梦回1912，开启一场民国时光之旅；
天街寻踪：听尘封往事，忆商海起伏，踏寻老杭州印迹；
南山如烟：寻历史印迹，听悠扬古琴；
南宋有约：探钱塘往事，忆沧海桑田；
禅茶一味：漫步山间采茶，感受禅茶文化；
探索杭州·富甲江南：探寻“红顶商人”传奇一生，细品味宋都繁华；
三竺禅修：尝素斋学礼佛寻古村，走天竺三寺禅修之路；
#匠造杭州#之一方印：访西泠旧址，听印石故事；
#匠造杭州#之一织锦：解读中国丝绸前世今生；
博览运河：访古韵金河，读历史画卷。

责任编辑：马琦敏

